

一六四〇至五〇年代花東縱谷中北段 村落區域勢力的變遷*

康培德**

摘 要

本文主在運用荷蘭東印度公司有關十七世紀東臺灣的資料，探討花東縱谷中、北段阿美族在一六四〇、五〇年代期間村落區域勢力的變遷。文章的首要目的是重建荷蘭文獻描述的聚落之地理位置，並考證其與相關阿美族村落或氏族間的關係。然後，以聚落為基本單位，進一步探討一六四〇、五〇年代期間，縱谷中北段村落的區域勢力消長與擴張範疇。

關鍵詞：臺灣原住民、阿美族、臺灣史、花蓮

* 本文主要改寫自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於 1997-98 年度所輔助的研究計劃《荷蘭時代花東地區原住民聚落景觀和族群互動之探討》，計劃編號 NSC 87-2415-H-026-001 內，「III：聚落分佈」、「IV：聚落與聚落間的關係」，和「VI：東印度公司對當地聚落勢力結構與住民的影響」的部份資料。而本文的完成，尚須感謝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施添福先生、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黃宣衛先生，及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詹素娟小姐及翁佳音先生。施先生、黃先生與詹小姐慷慨提供其個人與本研究主題相關之研究心得與建議，翁先生則不厭其煩地與筆者會商討論荷蘭文獻在譯文和詮釋上的細節。以及另外三位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的寶貴意見。作者在此一併銘謝之。文中的漏失、誤引等，則為作者的責任。

**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副教授。

一、導論

1624年正式在臺灣本島建立貿易轉運站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一六三〇年代中期武力降服臺灣西南部平原上的村落後，開始進一步向島上其他地域拓展其勢力範圍。遠在中央山脈東側的花東地區，1638年初先有上尉 Jan Juriaense 前來探訪今日臺東平原、太麻里河谷一帶。⁽¹⁾ 同年又有時任商務員 (onderkoopman) 的 Maarten Wesseling，爲了尋金而北上進入到花蓮一帶探訪。⁽²⁾ 到了一六四〇年代初期，東印度公司已分別在今日的秀姑巒溪口和花東縱谷中段一帶留有數名

-
- (1) *DZI*, pp. 396, 402, 405-406; 本文對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文獻資料出處的索引，採用國內研究荷蘭時代臺灣史學者慣用的記錄方式，除了有助於臺灣學術界作品在資料出處索引上的一致性和方便讀者查詢外，也易於在檢索時區分出一般著作與檔案文獻。如 Leonard Blusse 同時具有論文作者和原始文獻檔案編者的雙重身分；藉由索引表現方式的區別，將易於分別此一差異。有關國內出版研究荷蘭時代臺灣史學者的索引記載方式，請參考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79）；中村孝志，《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概說·產業》（臺北：稻鄉，1997）；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等。本文文中索引部份，*DZ* 表示 *Dagregister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即俗稱《臺灣日誌》的縮寫。*DZI* 表示《臺灣日誌》第一輯 (Leonard Blusse, W. E. van Opstall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 1629-1641* [Gravenhage: M. Nijhoff, 1984])；*DZII* 表示《臺灣日誌》第二輯 (Leonard Blusse,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I, 1641-1648* [Gravenhage: M. Nijhoff, 1995])；*DZIII* 表示《臺灣日誌》第三輯 (Leonard Blusse,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II, 1648-1655* [Gravenhage: M. Nijhoff, 1996])。DB 表示 *Dagh-register geg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 vant passerende daer ter plaetse als over geheel Nederlands-indin*，即俗稱《巴達維亞城日誌》的縮寫。本文引用的《巴達維亞城日誌》主要來自 DB, *Anno 1640-1641* (J. A. van der Chijs, ed., *Dagh-register geg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 vant passerende daer ter plaetse als over geheel Nederlands-indin, anno 1640-1641* [s-Gravenhage: Martinus Hijhoff, 1887]) 和 DB, *Anno 1641-1642* (H. T. Colenbrander, ed., *Dagh-register geg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 vant passerende daer ter plaetse als over geheel Nederlands-indin, anno 1641-1642*. [s-Gravenhage: Martinus Hijhoff, 1900])，分別表示《巴達維亞城日誌》在1640年到1641年、1641年到1642年間不同的兩冊日誌。《巴達維亞城日誌》有關臺灣部份資料的節譯，日譯本詳見村上直次郎，《パタヴィア日誌》（東京：平凡社，1972）。中譯本詳見郭輝，《巴達維亞城日記一、二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程大學，《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三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0）。VOC 表示 *Archiven van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即俗稱「海牙聯合東印度公司檔案」的縮寫。本文引用的「海牙聯合東印度公司檔案」主要來自 VOC 1218 f. 428-451 (*Tocht door mij Caesar gedaan voor hoeft toto opsoecken van de goudtgevende revier, als tot straffeën der rebellen van Talleroma ende Vadan*)，為 Cornelis Caesar 率領的探金行和對 Talleroma、Vatan 兩村的攻伐記錄。
- (2) *DZI*, pp. 409-410, 417-418.

派駐人員。⁽³⁾ 因此，東印度公司在往後的一六四〇、一六五〇年代，對花東縱谷中段一帶村落、人群的活動留下了相關記載。本文即主在探討此時期村落區域勢力的變遷，及東印度公司勢力的進入對在地村落勢力消長的可能影響。

近年來學術界討論荷蘭東印度公司治理臺灣時島上村落勢力變遷的文章，主要以臺灣西南部平原的區域村落勢力為例，探討東印度公司如何捲入地緣政治 (geo-politics) 及此一關係對公司和區域村落勢力雙方的影響。⁽⁴⁾ 本文則基於類似的論點，除了嚐試去界定東印度公司進入花東縱谷中、北段地域前當地的地緣政治外，還進一步去探討東印度公司進入後村落區域勢力的變遷，與東印度公司在此一變遷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不僅如此，本文並試著比較花東縱谷中、北段一帶與臺灣西南部平原此兩處分屬於東印度公司勢力邊陲與核心的地方，在面臨荷蘭人勢力時地緣政治發展上的區域差異。

二、檔案文獻

從 1638 年起，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商務檔案記錄《臺灣日誌》(*Dagregister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才開始有與花東地區相關的記載。這些記載，以東印度公司派在東臺灣 Pimaba 駐在員的報告摘要，和 Zeelandia 方面對花東地區的行政命令之摘要為主。⁽⁵⁾ 不過，與本文所涉及花東縱谷中段一帶的村落、住民有關者，尚有彙整東印度公司轄區商務檔案記錄的《巴達維亞城日誌》(*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 vant passerende daer ter plaetse als over geheel Nederlandts-indin*)；1642 年有關 Paulus Traudenius 探金隊一行的資料摘要；⁽⁶⁾ 1643 年 3、4 月間派駐在 Pimaba 的翻譯員 (tolck) Christiaen Smalbach 的第一手日誌報告 (*Daghregister gehouden bij Christiaen*

(3) *DB, Anno 1640-1641*, pp. 267-268; *DB, Anno 1641-1642*, p. 56; 郭輝,《巴達維亞城日記一、二冊》, 頁 314-315、321; 村上直次郎,《パタヴィア日誌》, 頁 132-133、144。

(4) Tonio Andrade, "The Mightiest Village: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Formosan Plains Austronesians, 1623-1636,"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學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主辦,「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 1998 年 5 月 16-17 日。

(5) Pimaba 即今日的卑南, Zeelandia 在今日的安平。後者為當時東印度公司駐臺的最高行政層級所在地。

(6) *DB, Anno 1641-1642*, pp. 147-151.

Smalbach in 't dorp Pimaba, beginnende den 22en maert ende eyndigende den 19en april 1643) ;⁽⁷⁾ 1643 年上尉 Pieter Boon 的探金隊日誌摘要 ;⁽⁸⁾ 和 1645、1646 年間 Cornelis Caesar 的探金行與 Talleroma、Vadan 兩村的征伐記錄 (*Tocht door mij Caesar gedaan voor hoeft toto opsoecken van de goudtgevende revier, als tot straffeen der rebellen van Talleroma ende Vadan*) 。⁽⁹⁾

三、聚落考證與地理分佈

荷蘭文獻中與本文所討論地域有關的村落，約有十二個與習稱「秀姑巒阿美」或「海岸阿美」相關的聚落，現將對其名稱的考證討論如下：⁽¹⁰⁾

1. Dorkop

又被記載為 Dorcop 或 Daracop。在已印行的《臺灣日誌》出現年代集中在 1648 年到 1650 年之間，內容大多在敘述聚落之間彼此的關係。⁽¹¹⁾ 地理位置約在今日花蓮縣玉里鎮觀音山附近，為阿美族 Taracop 氏族的故地。⁽¹²⁾

2. Patsiral

又被記錄為 Batsirael 或 Patsidar，在已印行的《臺灣日誌》內，出現年代集中在 1646 年到 1655 年之間。在荷蘭東印度公司勢力進入花東縱谷之際，Patsiral 大多與荷蘭人處於敵對狀態。⁽¹³⁾ Patsiral 也是阿美族的氏族之一。⁽¹⁴⁾ 依照其在

(7) *DZII*, pp. 80-90.

(8) *DZII*, pp. 137-142.

(9) VOC 1218, pp. 428-451.

(10) 荷蘭文獻的記載因未對名稱（如村名、地名、人名、船名等）拼法統一，為忠於原始資料起見，本文對名稱的拼法以引文出處的拼法為主。但是在下文討論聚落考證與地理分佈的段落，則標明了不同的拼法。

(11) *DZIII*, pp. 2, 31, 63, 149.

(12) 中村孝志，〈一六六五年的臺灣東部地方集會〉，《臺灣風物》43:1(1993)，頁 157。

(13) *DZII*, pp. 511, 534, 593, 600; *DZIII*, pp. 2, 31, 63, 116, 117, 149, 198, 502.

(14)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臺北：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1935），頁 396-414。

荷蘭文獻內的脈絡，與中村孝志荷蘭時代戶口表歸屬「卑南以北未歸順」欄項的屬性來看，當時的地理空間分佈應在今日花蓮縣壽豐鄉海岸山脈近縱谷一側。⁽¹⁵⁾ 此位置恰為移川與馬淵依據二十世紀初口傳判定的位置所在。不過，《臺灣日誌》在「地名表」(Lijst van historische plaatsnamen) 內誤將其置於今日臺東縣金峰鄉加走社。⁽¹⁶⁾ 在「地名索引」(Index van geografische namen) 內，也誤將其描述成位於 Pimaba 旁。⁽¹⁷⁾

3. Pisanan

又被記錄為 Pissonan 或 Pysanongh。在已印行的《臺灣日誌》中最早出現於 1643 年。Pieter Boon 的探金隊一行，在返程時曾夜宿於此。⁽¹⁸⁾ 《臺灣日誌》的「地名表」將其置於今日的花蓮縣鳳林鎮一帶。⁽¹⁹⁾ 若再考慮移川與馬淵的口傳資料，大約可再進一步認定是位在平林一帶。⁽²⁰⁾

4. Sapat

又被記錄為 Zapat 或 Sappat。在中村孝志的荷蘭時代戶口表，屬「卑南以北同盟村」欄項。⁽²¹⁾ 早在 1644 年的地方集會中，Sapat 的代表 Iraba 即獲頒象徵東印度公司在地方村落權勢的籐杖一枝。⁽²²⁾ 1646 年起，東印度公司即派兵員駐紮於此，⁽²³⁾ 當時的位置應在阿美族俗稱的 Karara 臺地，即漢文取其音譯的掃叭臺地。⁽²⁴⁾ 《臺灣日誌》的「地名表」將其誤置於今日臺東縣長濱鄉沙別社，⁽²⁵⁾ 沙別應為俗稱的掃別。

(15) 中村孝志，〈荷蘭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臺灣風物》44:1(1994)，頁 200。

(16) *DZII*, p. 676.

(17) *DZIII*, p. 657.

(18) *DZII*, p. 357.

(19) *DZII*, p. 686.

(20)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 401。

(21) 中村孝志，〈荷蘭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頁 201。

(22) *DZII*, p. 251.

(23) *DZII*, pp. 485, 486-487, 501.

(24) 中村孝志，〈一六六五年的臺灣東部地方集會〉，頁 157；〈荷蘭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頁 202。

(25) *DZII*, p. 687.

5. Serus

可能又被記錄為 Surut 或 Surassa。Serus 在 1644 年被 Vatan 所摧毀，住民淪為 Vatan 的奴役 (DZII, pp. 299-300)。因此中村孝志的荷蘭時代戶口表 (1647-1656 年) 也未見記載。從印行於十七世紀的「中國廣東、福建省以及附加的臺灣島海岸圖」中聚落的相對位置，可判定 Surut 位於今日秀姑巒溪與花蓮溪間的花東縱谷內。⁽²⁶⁾ 再進一步推測，Serus 應該是在 Vatan 附近。Paulus Traudenius 所率領的 1642 年探金隊一行，在一日之中 (2 月 8 日) 由北往南經 Pisanangh·Radaan (即 Vatan)，並在當地停留和長老 (oppersten regent) 商談後，尙能在傍晚時分抵達 Surassa，故應在 Vatan 南邊不遠之處。⁽²⁷⁾ 《臺灣日誌》的「地名表」將其置於今日的花蓮縣光復鄉。⁽²⁸⁾

6. Sorigol

又被記錄為 Serycol、Sergool 或 Sorgiol。在《臺灣日誌》，Sorigol 只出現在 1948 年 2 月 26 日的摘要，內容是關於 Soupra 住民與東印度公司交惡後，部份未參與對東印度公司不友善舉動的村民，在荷蘭人與大批 Pimaba 住民前來 Soupra 時，移住到與東印度公司維持友善關係的 Sapat、Dorcop 和 Sorigol 三村。⁽²⁹⁾ 中村孝志的荷蘭時代戶口表，將其列入「卑南以北同盟村」，與 Sapat 和 Dorkop 前後併列。⁽³⁰⁾ 依文獻脈絡與戶口表內所屬欄項的屬性來看，Sorigol 在

(26) Christine Vertente, Hsueh-chi Hsu and Mi-ch'a Wu, *The Authentic Story of Taiwan — An Illustrated History, based on Ancient Maps, Manuscripts and Prints* (Knokke: Mappamund, 1991), pp. 92-93. 「中國廣東、福建省以及附加的臺灣島海岸圖」大約繪製於一六五〇年代。參閱江樹生編審，《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 (上冊)》(臺北：漢聲，1997)，頁 63。理應不會有滅於 1644 年的 Serus 出現於圖上。但是圖上在 Madan (即 Vatan) 附近只有 Pisanan·Sibilan (即 Sibilien) 與 Surut 三個聚落位於花蓮溪和秀姑巒溪出海口間的縱谷地段。且圖上 Surut 的地理位置是位花蓮溪與中央山脈間，不可能為海岸山脈一帶聚落，如 Tavoran 等的別稱。再則，縱谷內已知的聚落僅 Serus 較符合 Surut 的拼音和地理位置，因此暫將兩者視為一。若此假設成立，Surut 之所以出現在繪製於一六五〇年代地圖上的原因，或許與測繪者的資訊有部份未更新有關。

(27) *DB, Anno 1641-1642*, p. 148; 郭輝，《巴達維亞城日記一、二冊》，頁 373；村上直次郎，《パタヴィア日誌》，頁 219。

(28) *DZII*, p. 687.

(29) *DZIII*, p. 3.

(30) 中村孝志，〈荷蘭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頁 20。

當時應該位在今日的花蓮縣瑞穗鄉、玉里鎮一帶。

7. Soupra

又被記錄為 Soupera 或 Supra。與東印度公司的關係，在一六四〇年代初期還算良好，但是到了四〇年代末期，卻加入 Patsiral 與荷蘭人為敵。⁽³¹⁾ 大概的位置在今日花蓮縣豐濱鄉秀姑巒溪一帶。⁽³²⁾ 中村孝志認為可能就是秀姑巒溪口的大港口。⁽³³⁾ 在《巴達維亞城日誌》1642 年有關 Paulus Traudenius 探金隊一行途經 Soupra 的資料裡，Soupra 被記錄成位於高山的平地上。⁽³⁴⁾ 若再一併考慮東印度公司前後三次大規模東臺灣探金活動時所走的路線和行經村落的前後關係，Soupra 應該是在切入今日海岸山脈的秀姑巒溪沿岸，且較靠近海岸線的山間平地上。⁽³⁵⁾

(31) *DZII*, p. 2.

(32) *DZIII*, p. 689.

(33) 中村孝志，〈從村落戶口調查看荷蘭的臺灣原住民統治〉，《臺灣文獻》47：1(1996)，頁 149。

(34) *DB, Anno 1641-1642*, p. 151; 郭輝，《巴達維亞城日記一、二冊》，頁 374；村上直次郎，《パタヴィア日誌》，頁 221。

(35) 荷蘭東印度公司三次大規模的東臺灣探金活動，都與 Soupra 住民有過接觸。以 1642 年的探金隊行程為例，一行人於 2 月 8 日回程時夜宿 Surassa (位 Vatan 附近)，2 月 9 日抵 Soupra。參閱 *DB, Anno 1641-1642*, p. 149; 郭輝，《巴達維亞城日記一、二冊》，頁 373；村上直次郎，《パタヴィア日誌》，頁 219。1643 年的探金隊則於 5 月 8 日回程時夜宿 Soupra，翌日一早出發，早上即經過 Tackerij (約在今日臺東縣長濱鄉)。參閱 *DZII*, p. 141。1645、1646 年間的探金活動，回程時於 12 月 31 日在 Sapat 附近遇見 Soupra 住民前來提供豬隻、小米餅、米餅、酒類等補給品。參閱 *VOC 1218*, p. 447v。1643 年的記錄暗示著 Soupra 的位置應該離海岸較近，但是 1645 年的記錄則暗示著似乎應該較靠近海岸山脈西側近縱谷一帶。另外，1645 年的記錄有 Supra 山 (berch van Supra) 的記載。參閱 *VOC 1218*, pp. 435v, 447v。不過，在 Cornelis Caesar 的記錄裡頭，若一山的名稱與聚落名雷同時，不盡然此山就在此聚落附近，有時兩者間的距離相差甚遠。像在 12 月 16 日的記錄中，探金隊一行由南往北於下午四時左右抵達「Sapat 或 Sacaraij 山腳」(aen de voet van Sappat ofte Sacaraij)。參閱 *VOC 1218*, p. 435。Sacaraij 即為 Sakiraya，而記錄裡所描述的地方應該是今日掃叭臺地一帶，與遠在縱谷北方的 Sakiraya 距離甚遠。因此，此處用 Sacaraij 命名所代表的只是荷蘭人在當時的空間認知，即由 Pimaba 北望所得的 Sakiraya 所在方向，反映在縱谷中極為突出的掃叭臺地上。所以說，Supra 山在文獻內雖在 Sapat 一帶，但是並無法證明 Supra 即在附近。

從 1645 年的記錄，Supra 居民帶補給品前來 Sapat 一事，似乎也不盡然證明 Supra 就在 Sapat 附近。因為探金隊於同年 12 月 16 日至 19 日北上路經 Sapat 一帶時，即未聞有 Supra 住民前來。但是縱谷附近一帶與東印度公司結盟的村落，像 Dorkop、Sapat 都有前來補給軍需，獨無 Supra 的記錄。第三次探金隊一行在回程時，並沒有沿今日秀姑巒溪至海岸一帶後再南下 Pimaba，故在當時依 Soupra 為東印度公司友村的前提下，在得知探金隊一行的活動後，在其回程時先於 Sapat 一帶等候，也並無不可能之處。既然此次在縱谷行進時，都未提及途經 Soupra 村落，故 Soupra 不在縱谷內是可被確認的。

8. Tackerij

又被記錄為 Taculis 或 Takulles。在中村孝志荷蘭時代戶口表內，與 Tackerij 音譯最近的聚落名是 Takilis，但是 Takilis 位在「卑南以北未歸順」欄項，與 Basey、Tallaroma 並列，在奇萊原野以北立霧溪下游出海口一帶。⁽³⁶⁾ Tackerij 的位置應在 Soupra 以南，因為在 Pieter Boon 的探金隊日誌摘要裡，提到探金隊自花蓮溪口一帶回 Pimaba 的路程是：Pisanan (5月6日) → Vatan (5月7日) → Soupra (5月8日) → Tackerij (5月9日) → Pimaba (5月11日)，行徑約略是由北朝南。⁽³⁷⁾《臺灣日誌》的「地名表」，將其置於今日臺東縣東河鄉佳里。⁽³⁸⁾但是，若按照探金隊的行程，即 Tackerij 離 Soupra 少於一日但是離 Pimaba 近兩日的行程來看，再配合相近的音譯，應該是大俱來社較有可能，即臺東縣長濱鄉大俱來一帶。⁽³⁹⁾

9. Tavoron

又被記錄為 Tavoring、Tauaron 或 Tawaron。在《臺灣日誌》中，出現於 1646、1647 兩年。⁽⁴⁰⁾應是漢文文獻所稱的太巴塢前身，⁽⁴¹⁾位於今日花蓮縣光復

阿美族的 Tsiopur (Soupra) 氏族在二十世紀初的口碑記載，其早期根據地可列舉出大港口（位秀姑巒溪出海口北岸）、納納（位秀姑巒溪出海口南岸）和奇密（位秀姑巒溪流經海岸山脈中段沿岸臺地上）三處。另一方面，口碑中在大港口西方一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小川注入秀姑巒溪，其附近一帶叫做 Tsiopur。參閱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 443。在今日大港口西方一公里處是協進農牧場，再往內兩公里餘是灣潭。若以 1642 年《巴達維亞城日誌》對 Soupra 所在地的描述為主，秀姑巒溪沿岸的高山平地只有奇密社一帶，方符合此可容納數百戶人口的聚落。此處可在《臺灣堡圖》編號第 220 號「奇密社」的地形圖裡一窺大概。而奇密社所在的高地，離灣潭尚有數公里。假如我們另外再考慮《臺灣日誌》於 1646 年 4 月 Zeelandia 對東臺灣村落的官方政策中，提及將允許 Sapat 下遷至平地，Supra 也將照辦乙事。參閱 *DZII*, pp. 486-487。由上述種種因素和可能性來看，Soupra 在十七世紀時的分佈範圍，曾從今日的奇密社一帶，遷徙（或部分遷徙）到秀姑巒溪出海口一帶。

(36) 中村孝志，〈荷蘭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頁 202。

(37) *DZII*, p. 141.

(38) *DZII*, p. 689.

(39) 秀姑巒溪口距離今日長濱鄉大俱來約六公里左右，此距離恰符合探金隊日誌摘要內 Soupra 與 Tackerij 間行進距離的時間。原文為探金隊一行於 5 月 8 日傍晚到達 Soupra，在此接受居民的招待並過夜。隔日一早出發，在早上即行經 Tackerij。參閱 *DZII*, p. 141。

(40) *DZII*, pp. 511, 593.

(41) 中村孝志，〈荷蘭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頁 200。

鄉靠海岸山脈一側。《臺灣日誌》的「地名表」，誤置於花蓮縣豐濱鄉。(42)

10. Tervelouw

又被記錄為 Terwelouw、Teribilouw 或 Tervello。第一次出現在《臺灣日誌》的 1645 年，不過文章敘述與 Tervello 的村民無關，主要是談 Pimaba 的要人 Paulus (即 Permonij) 與其他住民在 Tervello 附近一帶，被來自近處小山 (*het Cleen Geberchte*) 的住民殺害之事。(43) Tervelouw 的確切地點不詳，在 1650 年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敵對的村落中，Tervelouw 與 Patsiral、Soupra 是一同被提及的。(44) 在有關與 Tervelouw 交戰、獵首的村落中，已知的有 Sapat 和 Dorcop。(45) 這些村落都位在花東縱谷中、北部，約略在今日花蓮縣壽豐鄉以南到玉里鎮之間。如果 Tervelouw 與這些村落有地緣關係的話，應當也會在此區域。(46) 馬淵東一因其音近阿美語意指「大溪」的 Tarawalau，而將 Tervelouw 置於今日秀姑巒溪沿岸一帶。(47)

11. Vatan

又被記錄為 Vadan、Vattan 或 Maduan。在東印度公司的文獻內，Vatan 與荷蘭人似乎大多處於對立的狀態。其地理位置較無爭議，即位在今日花蓮縣光復

(42) *DZII*, p. 690.

(43) *DZII*, p. 429.

(44) *DZIII*, p. 116. 這裡用的是發自 Pimaba 的信件內容。但是在 Zeelandia 回覆駐紮 Pimaba 的 Jan de Bleuw 時，則說無需再與 Batsiral、Tervelouw、Soupra、Teroema 等叛變的村落協商和平了。參閱 *DZIII*, p. 117。內容敘述中多了臺東平原的 Teroema。因為 Zeelandia 發給 Pimaba 的信函是針對整個花東地區來做指示，不像 Pimaba 寄出的信函是依事件條列敘述，且對地方性的描述較細緻、正確。故在討論 Tervelouw 當時的可能位置時，只選 Pimaba 發出的信件為例。

(45) *DZIII*, pp. 116, 149.

(46) 中村孝志的荷蘭時代戶口表是將 Tervelouw 和 Batsirael 前後併列，同屬「卑南以北未歸順」欄項。參閱中村孝志，〈荷蘭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頁 200。此欄項所含的區域，約略在今日花蓮縣光復鄉以北，屬花東縱谷的北段（含）以北之處。但是 Tervelouw 在「卑南以北未歸順」欄項的排序是第一個，除 Batsirael 以外沒有別的村落適合作比對，故對其可能位置的考量應該可較偏南。另一方面，M. Wesseling 於 1641 年在 Soupra 與北方村落（應該是指海岸山脈北段一帶）村民代表會面時，大小村落共有七個，獨無 Tervelouw。這些村落除 Patscheral 外，都未在之後的文獻中出現，應該是一些人口較少的村落。參閱 *DZII*, pp. 6-7; 郭輝，《巴達維亞城日記一、二冊》，頁 320；村上直次郎，《パタヴィア日誌》，頁 142-143。所以，Tervelouw 的位置，有可能是在花東縱谷北段以南一帶。

(47) 馬淵東一，《馬淵東一著作集》第二卷（東京：株式會社社會思想社，1974），頁 415。

鄉，為漢文文獻中馬太鞍的前身。

12. Verekiel

只出現在《臺灣日誌》1647年9月6日的摘要內，內容是敘述 Batseral 的住民攻擊了 Soupra、Tavoron、Verekiel 與 Vadan 四村，其中 Verekiel 住民被取走一個首級。⁽⁴⁸⁾ Verekiel 的確切位置不詳，中村孝志的戶口表亦無記錄。《臺灣日誌》的「地名索引」只簡單的註解 Verekiel 位於東臺灣。⁽⁴⁹⁾ 若上述 Batseral 攻擊的四個村落彼此間有地緣關係的話，Verekiel 應在今日花蓮縣南半部一帶，但是確切的位置不詳。

圖一表示這十二個村落在當時的概略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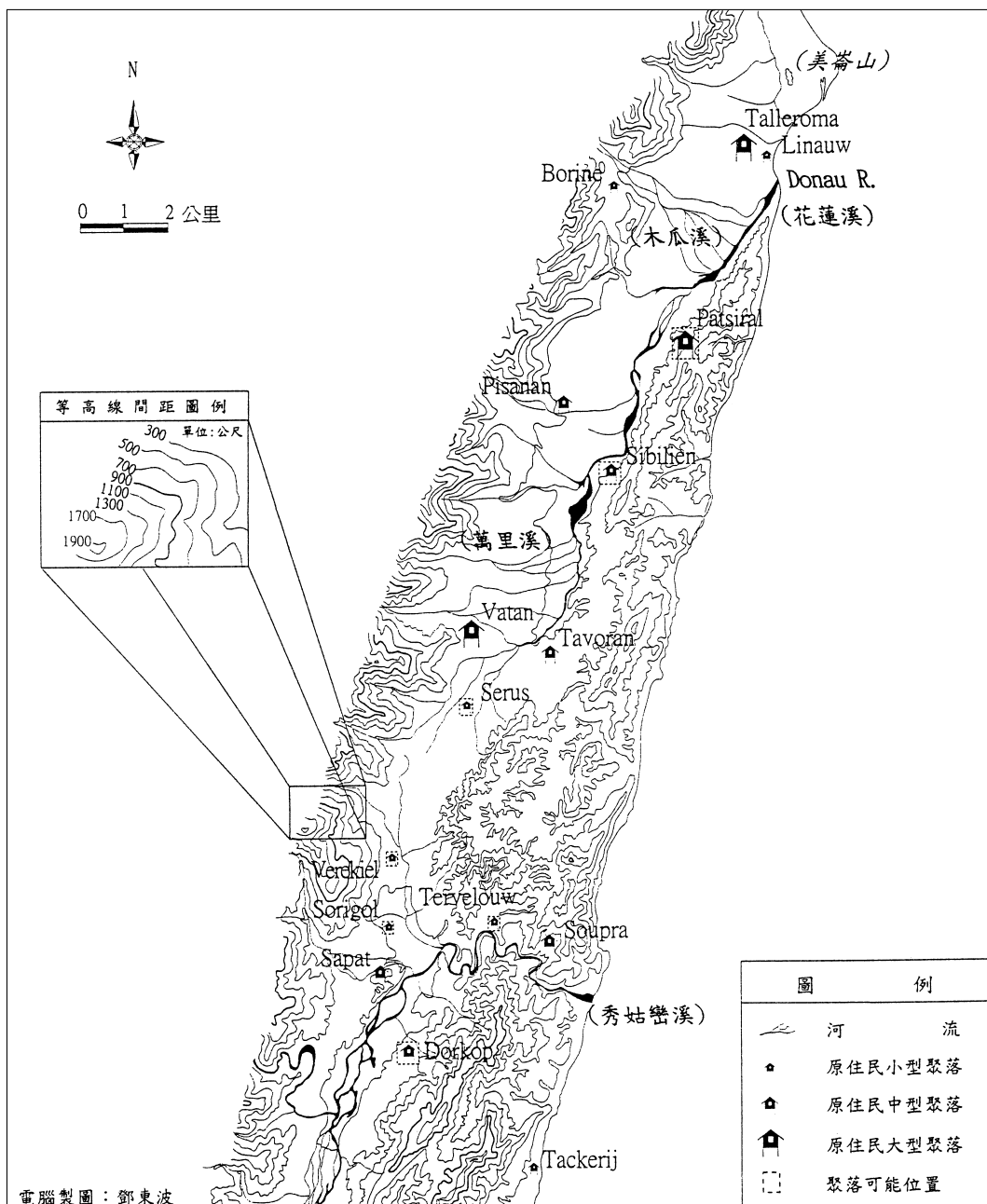
四、十七世紀的村落戶口數

荷蘭東印度公司會對歸順的臺灣原住民，斷斷續續地舉辦「地方集會」(landdag) 來宣示其行政統治。在臺灣的地方集會一般又分為「北部集會區」、「南部集會區」、「淡水地方集會區」與「東部集會區」四處。「北部」與「南部」的劃分，約是以東印度公司在臺的最高行政機構所在地 Zeelandia (今日的臺南縣安平鎮) 為界，從今日的臺南縣到臺中縣、南投縣，都算「北部集會區」；Zeelandia 以南的高雄縣、屏東縣，則算「南部集會區」；「淡水地方集會區」則以今日臺北縣市所及的地理空間為中心，擴散到今日苗栗縣與宜蘭縣；至於「東部集會區」約略等同於今日的花蓮縣和臺東縣。但是在荷蘭統治期間，東印度公司對「東部集會區」的控制能力，主要集中在東部行政中心 Pimaba，對花東縱谷北端與奇萊原野的統治力較弱。因此，當東印度公司對前來參加「地方集會」的村落代表徵詢該年度當地的人口數、戶口數時，東部集會區愈往北邊的村落，即會因無人出席會議而未能留下相關的統計資料於檔案文獻內。

花蓮地區的村落，在荷蘭文獻內有留下人口資料的只有 Dorkop、Sapat、

(48) *DZII*, p. 593.

(49) *DZII*, p. 692.



圖一 一六四〇、五〇年代花東縱谷中、北段村落圖

Sorigol、Soupra 與 Terwelouw 五個村落，這五個村落都位在縱谷中段或同緯度的海岸線一帶。不過，「東部集會區」因為是東印度公司轄下四個集會區最弱的一環，所記錄的村落人口資料只有戶口數，而沒有人口數。現將這五個村落於僅知的 1647 年、1648 年、1650 年、1654 年、1655 年、1656 年戶口數整理如下表一。

表一 荷蘭時代村落戶口數

村落 \ 年代	1647	1648	1650	1654	1655	1656
Dorkop	110	114	100	110	110	90
Sapat	75	92	106	106	80*	40
Sorigol	34	36	76	76	76	30
Soupra	130					
Terwelouw**	20	20				

資料來源：中村孝志，〈荷蘭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頁 200、202、204。

說明：*中村孝志在 1993 的文章〈一六五五年的臺灣東部地方集會〉裡，將 Sapat 的戶口數記錄為 86。中村孝志，〈一六五五年的臺灣東部地方集會〉，頁 160。

** Terwelouw 在戶口表內的數字並未加上括號，依照中村孝志戶口表的表示法，加上括號的數字表示戶口數，未加上括號的數字表示人口數。按整個花蓮地區原住民村落人口資料，在荷蘭時代都只提供戶口數，全未有人口數的資料。獨 Terwelouw 的數據未加括號，可能為遺誤之故。不過，Terwelouw 的人口資料確實度可能極低，因為其為表一裡六個村落中，唯一屬於戶口表內「卑南以北未歸順」欄項。而此欄項內十四個村落，除 Terwelouw 以外，全無任何人口、戶口數值留下。

從表一僅可得知一六四〇、五〇年代左右，十二個村落內，五個聚落零零散散的戶口數。這些資料雖不足以供我們去分析當時代的人口結構 (population structure)，但是可作為下面段落討論村落互動關係時的補充資料。

五、一六四〇、五〇年代的村落互動

(一)縱谷中段的大聚落 Vatan 與 Serus 的滅社

荷蘭東印度公司派駐臺灣的第八位最高行政首長 Francois Caron (任期 1644-1646)，在他 1646 年 1 月 31 日呈給派駐爪哇總督 C. van der Lijn 的信函

中，即提到 Cornelis Caesar 與 Nicasius de Hooghe 率領東印度公司探金隊赴今日立霧溪口一帶探勘時，回程對縱谷中的 Vatan 討伐之事。信件中的 Vatan，被形容成是臺灣島上數個大村落之一。⁽⁵⁰⁾ Vatan 確切的人口數是多少並不詳，但是在文獻記錄中，似乎是縱谷內重要的聚落之一。早在 1638 年，Maarten Wesseling 為探金目的前來東臺灣而活動範圍尚未脫離 Pimaba 一帶時，Vatan（時拼為 Maduan）即為縱谷內 Wesseling 記錄到的少數村落之一。⁽⁵¹⁾

1643 年，Christianen Smalbach 在他的日誌報告中提到：依據當地住民報導，Vatan 住民攻克了一名叫 Serus 的村落，並將後者的住民併入 Vatan 村中為奴。三日後，該日誌記載 Pimaba 的貴族 Permonij 報稱：⁽⁵²⁾ 依據秀姑巒溪口一帶 Soupra 村的長老（oppersten）所言，東印度公司留駐 Vatan 的士兵 Jan Huybertsz. 並非自然病故，而是被 Vatan 二到三名長老（opperhoffden）趁其生病時杖擊致死，首謀者是一叫 Oerganga 的老人。提供消息的 Soupra 村長老，要求 Permonij 勿為此事將荷蘭人帶至其村，否則恐怕 Vatan 村民將殺他報復，並摧毀 Soupra 全村。⁽⁵³⁾ 此時期的文獻資料暗示著，Vatan 在縱谷內的地位似乎是強悍的。在另一方面，Vatan 有相當長的時間——至少在荷蘭東印度公司勢力影響東臺灣時期，是讓荷蘭人無法掌握的村落。除了上述擊殺東印度公司士兵事件的因素外，早在 1641 年，派駐 Pimaba 的 M. Wesseling 也已計劃對 Vatan 的不服從施以武力，只是從現有檔案文獻無法確認起因為何。⁽⁵⁴⁾ 但是到了 1642 年初，荷蘭東印度公司駐臺最高行政長官 Paulus Traudenius（任期 1641-1643）率軍前來東臺灣探金失敗，在回程經過 Vatan 時，村中的長老 Roringh 率眾表示歡迎，除了對東印度公司一行之前擊敗 Sibilien 鄰近一帶村落的事大感高興外，並要求荷方留派一人學習其語言。⁽⁵⁵⁾ 隨後，Roerongh（即 Roringh）在 Christiaen

(50) *DZII*, pp. 465-466.

(51) *DZI*, p. 418.

(52) 在 1643 年時，Soupra 為 Pimaba 的住民所保護。1644 年 9 月的《臺灣日誌》提到 Vatan 住民趁 Soupra 村民在田間工作時進襲，與駐守 Soupra 的 Pimaba 住民交戰之事。參閱 *DZII*, pp. 321, 327。因此，Soupra 的長老對 Pimaba 貴族稟報訊息，再傳到東印度公司派駐在 Pimaba 的駐在員耳中，並不是件不合理的事。

(53) *DZII*, p. 83.

(54) *DZII*, p. 6; *DB, Anno 1641-1642*, p. 55; 郭輝，《巴達維亞城日記一、二冊》，頁 320；村上直次郎，《パタヴィア日誌》，頁 142。

(55) 郭輝，《巴達維亞城日記一、二冊》，頁 373；村上直次郎，《パタヴィア日誌》，頁 219。

Smalbach 的 Pimaba 駐地日誌中被提到。當 Smalbach 欲派人取回他遺留在 Vatan 的背籃 (canasser) 時,對方 (即 Roerongh) 卻要求以 cangan 布交換,作為保管期間的費用。⁽⁵⁶⁾ 1643 年,當 Pieter Boon 的探金隊回程夜宿 Vatan 時,即發生村中一長老與許多住民攜物離村,讓探金隊一行於當晚保持高度警戒,以防萬一。⁽⁵⁷⁾ 到了 1644 年,當東印度公司舉辦地方會議時,據報 Vatan 與 Tesseroema (即 Talleroma) 兩村曾阻礙東臺灣一些村落的參加。⁽⁵⁸⁾ 為此,東印度公司在 Batavia 總部方面的記錄,將 Vatan 列入對公司盟友懷有敵意的村落名單中。⁽⁵⁹⁾ 因此,當 1645 年東印度公司計劃發動第三次大規模東臺灣探金活動之際,另一目的即是要攻打 Vatan 等列為敵對者的村落。⁽⁶⁰⁾

Cornelis Caesar 與 Nicasius de Hooghe 所率領的 1645 年探金隊,在回程時攻擊了 Vatan 之後,Vatan 住民即試著向東印度公司求和。⁽⁶¹⁾ 從此之後,Vatan 的勢力似乎開始衰微;如 1646 年,Takulis 與 Vatan 為狩獵之事交惡後,Takulis 住民即獵了 Vatan 村民四個首級。⁽⁶²⁾ 1647 年,Patsiral 的勢力南下時,Vatan 被獵的首級是同時被記錄的受害村落中損失最大的。⁽⁶³⁾ Patsiral 勢力的南下,引發了縱谷中段村落勢力的重整。1648 年起,分別有 Soupra、Dorkop 等村開始違背東印度公司的訓令,對臣服於公司的村落發動獵首戰爭。但是在東印度公司所謂的「叛變」(rebellion) 村落名單中,Vatan 卻不在其中。

提到 Vatan,就會間接聯想到 1643 年為 Vatan 所毀的 Serus。比起 Vatan, Serus 應是一較不起眼的小聚落。東印度公司駐臺長官 Paulus Traudenius 1642 年親率的探金隊,曾在 2 月 8 日當晚夜宿該村,並受當地住民招待。⁽⁶⁴⁾ 因此,可暫且假設當時 Serus 應與東印度公司關係不錯。在 Vatan 摧毀 Serus 並將村民併

(56) *DZII*, p. 84.

(57) *DZII*, p. 141.

(58) 郭輝,《巴達維亞城日記一、二冊》,頁 413;村上直次郎,《パタヴィア日誌》,頁 279。

(59) 郭輝,《巴達維亞城日記一、二冊》,頁 524;村上直次郎,《パタヴィア日誌》,頁 294。

(60) 郭輝,《巴達維亞城日記一、二冊》,頁 449;村上直次郎,《パタヴィア日誌》,頁 330。

(61) *DZII*, pp. 487, 511.

(62) *DZII*, p. 534.

(63) *DZII*, p. 593.

(64) *DB, Anno 1641-1642*, p. 148; 郭輝,《巴達維亞城日記一、二冊》,頁 373;村上直次郎,《パタヴィア日誌》,頁 219。

入 Vatan 後，Serus 有一住民向東印度公司留駐 Pimaba 的人員報告此事，並提供了關於 Pisanan、Suplien、Taccalies 等村動態的情報。⁽⁶⁵⁾ Vatan 將 Serus 併吞的舉動，目的似乎在擴充其所能控制的住民與相關資源，並無滅絕 Serus 住民之意。此點可從之後 Serus 住民往來為 Vatan 長老 (oppersten) Roerongh、與東印度公司留駐 Pimaba 的日誌記錄員兼翻譯 Christiaen Smalbach 傳話交涉，得到旁證。⁽⁶⁶⁾ 另外，Serus 住民也報稱其居民為 Vatan 所「奴役」(. . . Vattan, die de Serussers tot haere slaeven gemaect . . .)，而不是被驅離或屠殺。⁽⁶⁷⁾ 不過 1643 年之際，東印度公司的勢力似乎只能到達 Soupra 與 Dorcop 一帶，連 Sapat 都還未聞有公司的留駐人員。同年 4 月 Serus 被摧毀之後，Pieter Boon 的探金隊雖曾浩浩蕩蕩地在東臺灣展示了東印度公司的實力，但是 Zeelandia 方面付予的任務是到 1642 年駐臺長官親征失敗而未到達的 Tarroboan (即今日立霧溪口沿岸) 一帶探金，而未對 Vatan 等對東印度公司懷有敵意的村落存有征伐之意。一直要到 1645 年決議第三次大規模東臺灣探金行動時，才決定附帶征伐 Vatan 等所謂的敵村。⁽⁶⁸⁾ 征伐之後，Zeelandia 方面對東臺灣村落有一類似官方政策的指令。當 Vatan 對東印度公司乞和時，⁽⁶⁹⁾ 公司決定，唯有在 Vatan 與東印度公司同盟村和平共處並不加以攻伐的前提下，才願接受 Vatan 的請求。⁽⁷⁰⁾ 不過，從此 Serus 未再被提及，也不見任何「復村」的記錄。在三百年後移川子之藏與馬淵東一合輯的口傳資料與分析中，也沒有和 Serus 相關的資料出現。

(65) *DZII*, p. 83.

(66) *DZII*, p. 84.

(67) *DZII*, p. 83.

(68) *DZII*, p. 460. 引發東印度公司征伐 Vatan 的動機相當多，《巴達維亞城日誌》記載了 Vatan 是阻止其周遭村落代表去參加 1644 年 3 月東部地方集會的罪魁禍首之一。參閱 *DB, Anno 1643-1644*, p. 127; 郭輝，《巴達維亞城日記一、二冊》，頁 413; 村上直次郎，《パタヴィア日誌》，頁 294。並對東印度公司的同盟村施加敵意 (. . . in 't plegen van hostiliteitjen omtrent onse bondgenoten, . . .)。參閱 *DB, Anno 1643-1644*, p. 138; 郭輝，《巴達維亞城日記一、二冊》，頁 425; 村上直次郎，《パタヴィア日誌》，頁 294。《臺灣日誌》則明載 Vatan 住民於 1644 年 6 月 24 日對 Soupra 的攻伐。參閱 *DZII*, pp. 321, 327。

(69) 原文直譯為「如果要求東印度公司的友誼」(ingevalle 's Compagnies vriendtschap mochten versoucken)。參閱 *DZII*, p. 487。有關東印度公司檔案文獻「和平」與「友誼」兩詞在十七世紀異文化接觸時實際意涵的討論，請參閱筆者在他文的詮釋。康培德，〈南勢阿美聚落、人口初探：十七到十九世紀〉，《臺灣史研究》4:1 (1999)，頁 38-40。

(70) *DZII*, p. 487.

(二) 縱谷北段的區域勢力 Patsiral

前文已提到數次的 Patsiral，在一六四〇年代的花東縱谷也是重要的村落。1646 年，當駐 Sapat 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士兵，差遣 Soupra 住民為和平協商去 Vatan 做先頭人員時，被派遣的 Soupra 住民，也被要求順道探查 Patsiral、Tellaroma、Pissouan 與 Tauaron 四村的勢力，以了解其是否能與東印度公司對抗。⁽⁷¹⁾ 在往後數年的《臺灣日誌》記錄中，這四個村落只有 Patsiral 在花東縱谷的聚落戰爭中扮演要角。雖然早在 1641 年 3 月，M. Wesseling 爲了尋金曾在 Soupra 與來自 Patscheral (即 Patsiral) 等七村的住民代表和好。⁽⁷²⁾ 但是，1642 年 Traudenius 所率的探金隊一行，卻在 2 月 6 日離開 Sibilien 繼續行進時，與應該是 Patsiral 爲首的村落起了衝突，造成 Patsiral 方面死傷 40 餘人的事件。⁽⁷³⁾ 在 1647 年的記錄中，Patsiral 先後攻擊了 Soupra、Tavoron、Verekiel 與 Vadan 四個村落的村民，並分別截取了二個、四個、一個和六個首級。Patsiral 這些攻擊行動似乎觸怒了 Pimaba 住民，於是要求東印度公司派駐 Pimaba 的士官 Jan Jansz. van den Berch 准其攻擊 Patsiral。⁽⁷⁴⁾ 隨後，在同年度 10 月 8 日寄自 Pimaba 的書信顯示，Patsiral 持續攻擊其他村落，不論是東印度公司的友

(71) *DZII*, p. 511.

(72) *DZII*, pp. 6-7; 郭輝，《巴達維亞城日記一、二冊》，頁 320；村上直次郎，《パタヴィア日誌》，頁 142-143。

(73) *DB, Anno 1641-1642*, p. 148; 郭輝，《巴達維亞城日記一、二冊》，頁 372-373；村上直次郎，《パタヴィア日誌》，頁 218-219。1642 年的探金隊記錄，僅見於《巴達維亞城日誌》的摘要版本。文中提到 2 月 6 日 Traudenius 一行人出發越過急流之河、山間大谷後，附近有 8 個村落的武裝男子 400 人前來歡迎。文中雖未提及此 8 個村落名稱為何，但是若考慮能動員 400 個武裝男子的力量，應該是重要的勢力。查證 Traudenius 一行在當日的活動範圍，不會離開花東縱谷北段一帶，而此處附近有一在阿美族口碑中氏族人數最多的 Patsiral，且 Patsiral 也曾在荷蘭文獻中出現多次。但是我們若進一步考慮海岸山脈北段的地形，會發現此處並不適合形成人口眾多的大聚落。海岸山脈西緣有花蓮溪切過山腳，東緣是太平洋，海岸一帶的平原低地可說十分狹窄，甚至缺乏。可是 Patsiral 卻是阿美族口碑中位於此處、人口最多的氏族。參閱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 396。因此，文獻中這八個集體行動的村落，即有可能大部份與 Patsiral 有關。因為此處的地形無法容納一個大聚落，Patsiral 勢必要分散其住民人口為散村狀態，或是俗稱的分社。因此，在荷蘭人的記錄內，Patsiral 極有可能是一個 Patsiral 母村（或稱主社），外加數個與母村相隔一些距離的子村（或稱分社）所構成。這群荷蘭東印度公司記錄下的村落，在當時可能尚存著對母村較強烈的認同，或整體一致性的認同，即所謂 Patsiral 的認同，而較少有獨立分社認同的行為出現。

(74) *DZII*, p. 593.

村或敵村，累積已有二十人遇害。⁽⁷⁵⁾ 儘管如此，Pimaba 為何會要求荷蘭人出兵攻擊遠在花東縱谷北端的 Patsiral？其動機不詳，可能與當時受 Pimaba 保護的 Soupra 被攻擊有關吧！不過，駐防 Pimaba 的 Jan Jansz. van den Berch 要求請示 Zeelandia 方面並獲許可後，才准 Pimaba 與 Patsiral 開戰。此許可一直到隔年 4 月 12 日 Zeelandia 發出的決議文書才得到。⁽⁷⁶⁾ 此一猶豫不決，讓東印度公司和 Pimaba 都付出了代價，即 Soupra 倒向了 Patsiral 的陣營。1648 年初，Soupra 轉變態度與東印度公司為敵，除了藉由直接摧毀東印度公司信物以挑戰其權威、威嚇駐縱谷中段的荷蘭人外，且在風聞東印度公司與 Pimaba 將前來調查時，已事先焚村它遷。值得注意的是，主謀的村民是遷往 Patsiral，剩下的則遷往東印度公司的友村，像 Sapat、Dorcop、Sorgiol。此三村隨後又因 Patsiral 的恫嚇，而向東印度公司要求南遷到 Pimaba 的領地。⁽⁷⁷⁾ 這裡強烈暗示著 Soupra 的分裂與轉換陣營，與 Patsiral 的介入有密切的關係。

1647 年到 1648 年間，可以明顯看出 Patsiral 的勢力，正把 Pimaba 和東印度公司的勢力從秀姑巒溪口一帶逐出，並威脅在縱谷中段原先的村落勢力結構。為了應付此一危機，Zeelandia 方面曾一度建議駐守 Pimaba 的 Jan Jansz. van den Berch 與十名士兵考慮移駐 Sapat，協助東印度公司當地的結盟村落對抗 Patsiral。不過，此建議在評估可能會對東印度公司帶來的風險後，於十三天後取消。⁽⁷⁸⁾ Patsiral 南下的勢力，到 Dorcop 一帶即勢均力敵。1648 年 8 月 1 日的《臺灣日誌》即記載了 Dorcop 住民在與 Patsiral 的衝突中取了後者兩個首級。⁽⁷⁹⁾ 隨後一直到 1650 年左右 Patsiral 的勢力一直未見再南下，在當年年中時據報 Patsiral 與 Pimaba、Dorcop 兩村村民有一場劇烈的戰事，戰後 Patsiral 敗逃。⁽⁸⁰⁾ 到了 1655 年 4 月左右 Pimaba 住民在與 Patsiral、Soupra 兩村的戰事又造成了對方損失兩人。⁽⁸¹⁾ Patsiral 勢力的南下，似乎在此於 Pimaba 勢力達成

(75) *DZII*, p. 600.

(76) *DZIII*, p. 31.

(77) *DZIII*, p. 2.

(78) *DZIII*, pp. 31, 35.

(79) *DZIII*, p. 63.

(80) *DZIII*, p. 149.

(81) *DZIII*, p. 502.

一平衡後而無法再擴張。

(三)縱谷內其他重要的村落勢力

縱谷內的重要村落，除了 Vatan、Patsiral 兩大勢力以外，在文獻記錄中，由南到北尚有 Dorkop、Sapat、Tavoron 與 Pisanan 等四個具影響力的村落。

Dorkop，1641 年的《巴達維亞城日誌》，提到東印度公司爲了尋金，之前即派有兩名荷蘭人駐守於此。當商務員 M. Wesseling 到訪時，爲了進一步了解當地住民和調查在地的信仰崇拜，而繼續留駐此二人於 Daracop (即 Dorkop)。(82) 不過 Dorkop 之後似乎並未臣服於東印度公司之下。1645、1646 年的探金隊記錄提到，Dorkop 住民對路過的東印度公司一行之提供一隻豬與些許酒類等補給品並表示歡迎，是出於懼怕探金隊的勢力，而非出自其意願。因爲 Dorkop 住民曾拒絕向東印度公司臣服，只是當時改變初衷，願意歸順。(83) Dorkop 在 1645 年底以前對東印度公司的態度，應該與其和 Vatan 的關係有關。記錄中，Dorkop 原是 Vatan 的友村。(84) 1645 年被攻伐之前的 Vatan 與東印度公司已經算是交惡了數年。在探金隊於回程攻擊並焚燒了 Vatan 村以後，一行人再經過 Dorkop，Cornelis Caesar 即要求 Dorkop 派代表於 4 日後到 Pimaba 表示歸順，不然將視其爲敵人。(85) 此時的 Dorkop 在得知 Vatan 的處境後，準時派員到 Pimaba，並帶上了象徵歸順的五頭豬隻。(86) 1648 年，Dorkop 成爲 Soupra 分裂後部分住民的移居處。(87) 但是，隨後即發生 Dorkop 住民砍殺了七名來自東印度公司友村的住民，並取首級的事件，引起了一陣騷動與不安。(88) 同年年中，Dorkop 又擊

(82) *DB, Anno 1640-1641*, pp. 267-268; 郭輝，《巴達維亞城日記一、二冊》，頁 314-315；村上直次郎，《パタヴィア日誌》，頁 132-133。原文為 *Voorschreve 2 Neederlanders waren andermael in Daracop gelaten, om met d'inwoonder naerder kennisse te maken ende nader ondersoek near 's werelts afgodt te doen*。郭輝的中譯本誤譯為「上列荷蘭人二人與土番更加親善，為調查偶像而再逗留達拉哥布 (Daracop)」。

(83) *VOC 1218*, p. 435.

(84) *VOC 1218*, p. 447v.

(85) *VOC 1218*, p. 447v.

(86) *VOC 1218*, pp. 448-448v.

(87) *DZIII*, p. 2.

(88) *DZIII*, p. 31.

殺了兩名 Patsiral 住民。⁽⁸⁹⁾ 到了 1650 年，Dorkop 分別與 Patsiral、Tervelouw 在戰事中互有輸贏。⁽⁹⁰⁾ 爲什麼 Dorkop 會在 1648 年突然發生砍殺東印度公司友村村民首級的事，原因不詳。但是由於在此事件之前之後，都未發生過類似的事，因此或許是誤殺，只是文獻並未交代。另一可被接納的解釋則是，此舉可能是作爲村中戰士爲在出征前求得神祐而馘首的行動。

比起 Soupra 和 Dorcop 兩地早在 1641 年前後，就已有東印度公司人員派駐在當地學習語言的情況，⁽⁹¹⁾ Sapat 遲至 1646 年方有東印度公司的士兵派駐當地。⁽⁹²⁾ 之所以如此，可能和 Sapat 原居地的地勢偏高有關。⁽⁹³⁾ 1645 年的探金隊隨行記錄，已提到 Sapat 係位在與其同名的山上。⁽⁹⁴⁾ 1646 年，在 Zeelandia 方面對東臺灣村落的官方政策裡，提到將允許 Sapat 住民移居到低處。⁽⁹⁵⁾ 1646 年之後，Sapat 儼然成爲東印度公司在縱谷內一相當重要的據點；駐守當地的荷蘭人，因地緣上的優勢，較易蒐集有關 Sapat 北方東印度公司勢力未進入地區的資訊，以送回 Pimaba，再輾轉傳回 Zeelandia。⁽⁹⁶⁾ 所以，當 Patsiral 勢力南下，與東印度公司的勢力起衝突時，Sapat 即首當其衝成爲被攻擊的對象之一。⁽⁹⁷⁾ 東印度公司爲了應付危機，卡維持在當地的勢力與鞏固和同盟村之間的關係，一度決議要將駐防 Pimaba 的士官 Jan. Jansz. van den Berch 與十名士兵移駐 Sapat，不過後來未予施行。⁽⁹⁸⁾ 當 Patsiral 勢力南下的危機緩和後，東印度公司與 Sapat 依然維持著主從關係。在一六五〇年代的《臺灣日誌》裡，仍可看到荷蘭人留在當地的記載。⁽⁹⁹⁾

(89) *DZIII*, p. 63.

(90) *DZIII*, pp. 63, 149.

(91) *DB, Anno 1640-1641*, p. 267; 郭輝，《巴達維亞城日記一、二冊》，頁 314、362；村上直次郎，《パタヴィア日誌》，頁 132、202。

(92) *DZII*, pp. 485, 487, 501.

(93) 在東臺灣地區，地勢偏高且不在荷蘭人必經之處的村落，一般而言，在文獻中出現的比率偏低，如 Tavoran 等即是明顯的例子。

(94) *VOC 1218*, p. 435.

(95) *DZII*, pp. 486-487.

(96) *DZII*, pp. 511, 534.

(97) *DZIII*, pp. 2, 116, 117.

(98) *DZIII*, pp. 31, 35.

(99) *DZIII*, pp. 429, 501, 577-578.

Tavoron，即太巴壠的前身。1641年M. Wesseling尚在東臺灣一帶活躍時，曾將Tavoron與Vatan並列為東印度公司的叛村（de rebellen），並計劃對其施以攻伐。⁽¹⁰⁰⁾不過，東印度公司似乎對Tavoron一直無法掌握；1646年，還試著藉由前去Vatan和談的Soupra住民，探察東印度公司勢力範圍以北的Tauaron（即Tavoron）等重要村落的對抗實力。⁽¹⁰¹⁾到了1647年，當Patsiral勢力南下之際，Tavoron與Vatan等村都有居民被滅首。⁽¹⁰²⁾令人不解的是，當東印度公司分別於1642、1643、1645年舉行三次大規模東臺灣探金行動，大批人馬在花東縱谷中、北段來回時，並未有Tavoron的任何記錄。《中國廣東、福建省以及附加的臺灣島海岸圖》此張記錄東臺灣聚落最詳盡的地圖，已有Pisanan、Sibilian、Madan（即Vatan）、Surut、Daracop、Sapajat（即Sapat）等前文討論介紹過的村落，但是獨無Tavoron。⁽¹⁰³⁾原因可能與當時Tavoron位置太偏海岸山脈內側有關吧！

另一個同為東印度公司於1646年嘗試去探查其對抗實力的村落是Pisanan。⁽¹⁰⁴⁾與Tavoran不同的是，東印度公司三次探金行的記錄都有Pisanan，其與東印度公司的關係可說若即若離。1642年的記錄只提到探金隊一行途經Pisanangh，直接前去Radaan（... ende haer reijs vorderende marcheerden voorbij 't dorp Pisanangh tot int groote dorp Radaan, ...），⁽¹⁰⁵⁾似乎未與Pisanan的住民有進一步的接觸。1643年，探金隊在5月6日中午行進途中，遇到落雨，使得一早即沿花蓮溪上溯的隊伍狼狽不堪；而在傍晚時刻抵達Pisanang（即Pisanan）時，即在當地過夜，接受住民的招待（..., waeren van de inwoonders redelijck wel getrackteert）。由此可以看出Pisanan至少未與東印度公司敵對。⁽¹⁰⁶⁾1645年的探金隊伍遭遇又不盡相同，一行人於12月29日中午離開

(100) *DZII*, p. 6; *DB, Anno 1641-1642*, p. 55; 郭輝，《巴達維亞城日記一、二冊》，頁320；村上直次郎，《パタヴィア日誌》，頁142。

(101) *DZII*, p. 511.

(102) *DZII*, p. 593.

(103) Vertente et al., *The Authentic Story of Taiwan — An Illustrated History, based on Ancient Maps, Manuscripts and Prints*, pp. 92-93.

(104) *DZII*, p. 511.

(105) *DB, Anno 1641-1642*, p. 148; 郭輝，《巴達維亞城日記一、二冊》，頁373；村上直次郎，《パタヴィア日誌》，頁219。

(106) *DZII*, p. 141.

Borine 南下 Pissannangh (即 Pisanan)，卻未記載任何與當地居民碰面或接受招待之事，只記錄了數名隨行人員不慎為當地田間四周的防禦倒鉤所傷；⁽¹⁰⁷⁾ 一名隨行的華人，更因闖入了當地人家的芋仔田 (oebisvelden)，而可能被田主用矛 (hasegaij) 傷及腿部。⁽¹⁰⁸⁾ 至於 Pisanan 與其它住民間的關係，在 1647 年以降 Patsiral 的勢力擴張過程中，既未聞與 Pisanan 相互攻伐之事，或參與 Patsiral 的勢力，南下攻伐與東印度公司同盟的村落。此外，1647 年之前，也無相關動態的記載。⁽¹⁰⁹⁾

- (107) 此種分佈於田間四周的倒鉤利器 (... , die aen de kanten met scheenangels beset was, ...)，可能是用來防止野獸侵擾與外人偷竊之用。參閱 VOC 1218, p. 446。
- (108) VOC 1218, p. 446。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大規模軍事行動，除了做為核心部隊的兵士之外，時常僱用華人擔任馱夫，負責搬運隨行的物件、軍需品等。以 1645 年的東部探金隊為例，在 Zeelandia 出發清點時，軍事人員 (militaire persoone) 有 218 人，負責陸上馱運的華人 (Chineesen om de bagagie over landt te dargen) 有 200 人之眾，另外再加上航海人員 (varende personen)、外科醫師 (Chijssrurgijns) 等，一行約 443 人之多。參閱 VOC 1218, p. 428。
- (109) 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文獻內相關記載的欠缺，並不意味 Pisanan 與其四周村落的關係就是和平的。除了此現象不符合南島文化以村落為單位、對外人施予具宗教祭祀意義的獻首活動外，在二十世紀初移川子之藏和馬淵東一的住民口傳資料中，也顯示了 Pisanan 與 Patsiral、Tsiwilian、Varoyan、Kuduvan、Vatan 等鄰近村落彼此征伐的現象。移川和馬淵的資料，主要是記錄影響戰敗一方遷徙的衝突事件，和當時村落之間敵對、結盟的關係。現將取自各地的說法，整理如下表。從表中可知口碑中 Pisanan 與其他村落的互動事實上是存在的。

表二 影響 Pisanan 遷徙之原因表

參與戰鬥的村落名 口碑來源	Pisanan	Patsiral	Tsiwilian	Varoyan	Kuduvan	Vatan	Pisanan 的結局
月眉社	-	+	+	+			逃到南方的馬蘭社方面
末廣社	-					+	先到貓公社附近的 Vareor，後來在 Tengarau 及水蓮尾附近重建聚落
太巴塢	○	○					受里漏、薄薄、七腳川等的攻擊而向南方逃走
馬太鞍 I	-	(-)	(-)			+	逃到 Patsiral、Tsiwilian 所屬的月眉、水蓮尾
馬太鞍 II	(+)	-	-		+		
馬九答社	+	-		+			
薄薄社	○	○					
六階鼻社							受拔仔社西方的布農族壓迫，遷往貓公及其他地方
池南社							因恐木瓜番的襲擊而向馬太鞍、拔仔社方面逃避

資料來源：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 397、407-409。

Sibilien 在東印度公司未能確定傳說中的金礦產地是否位於今日立霧溪口沿岸一帶時，也曾被誤認為是可能產金地之一。1641 年 M. Wesseling 在 Soupra 時，當地住民曾告知他們所戴的金飾來自 Sivilien (即 Sibilien) 與 Takijlis (即 Takilis)。(110) 不過，當時駐 Soupra 的士兵 Andriaen Watermont 隨後即澄清產金地主要來自 Takilis。(111) 東印度公司 1642 年的大規模探金行動是三次探金行動中唯一一次途經 Sibilien、並接受當地住民的招待。隨後，探金隊一行在今日海岸山脈北段一帶行進時，與應該是 Patsiral 爲主的勢力起了衝突；此時，是 Sibilien 住民向東印度公司一行暗示對方正聚眾準備發動攻擊。(112) 不過，如同 Patsiral、Pisanan 等這些位於花東縱谷、海岸山脈北端的村落，Sibilien 所處的地理位置，並不在東印度公司派有留駐人員的 Soupra、Dorkop，及後期的

說明：(1) Tsiwilian 即 Sibilien。Varoyan 據傳約在今日花蓮縣壽豐鄉一帶。參閱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 506-507。馬淵認為可能是 Borine。參閱馬淵東一，《馬淵東一著作集》第二卷，頁 412、416。Kuduvan 指的應該是今日木瓜溪一帶來自白葉山、銅門山的住民，荳蘭社與薄薄社認為其為七腳川社 (Chicasuan) 的舊名。但是根據月眉與大巴壟的口碑，卻是屬東賽德克的木瓜群。參閱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 407。

(2)+ 表示戰勝的一方，- 表示戰敗的一方，() 表示部分介入或可能有介入戰事，○ 表示兩者等同的關係 (如口碑中 Patsiral 是為 Pisanan 的住民所建)。

上述這些關於影響 Pisanan 遷徙的戰事或原因的口碑，因口碑提供者的立場，而有不同的詮釋。其可能動機除了提供者社群的文化體系，可藉由歷史事件的詮釋來合理化我群的存在外，亦有可能是因散社的 Pisanan 村民，在部份併入與口碑提供者有關係的社群後，對關係到社群內社會地位、資源分配等的議題時，可藉由歷史論述讓口碑提供者所屬的我群，合理化所有、或所中意的情況有關。有關南島語族如何藉由氏族起源 (origin)、先祖 (ancestry)、群體關聯 (alliance) 等歷史過程的論述，來合理化本身地位或資源分配等的文化特性，請參閱 James J. Fox 與 Clifford Sather 所編，討論南島語族起源、先祖、群體關聯的專書。James J. Fox and Clifford Sather, eds., *Origins, Ancestry and Alliance: explorations in Austronesian Ethnography* (Canberra: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6).

從移川和馬淵所編錄的資料來看，若要了解在口碑內容彼此互斥的情況下，何者為真何者為偽，以及 Pisanan 住民確切的移動原因與路線，尚需更多諸如了解每一口述者系譜身份背景，或發掘更多相關史料做進一步研究的重建工作。不過，無論如何，在此可確知的是 Pisanan 與其周遭村落互動是頻繁的。雖然這些資料與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理臺之際的情況不見得相同，但是至少可以推知 Pisanan 與其它村落的關係，在當時不致於會毫無往來。

(110) *DZII*, p. 6; *DB, Anno 1641-1642*, pp. 55-56; 郭輝，《巴達維亞城日記一、二冊》，頁 320；村上直次郎，《パタヴィア日誌》，頁 142-143。

(111) 郭輝，《巴達維亞城日記一、二冊》，頁 362；村上直次郎，《パタヴィア日誌》，頁 202-203。

(112) *DZII*, pp. 12-13; *DB, Anno 1641-1642*, pp. 147-148; 郭輝，《巴達維亞城日記一、二冊》，頁 372；村上直次郎，《パタヴィア日誌》，頁 218-219。

Sapat 等海岸山脈或花東縱谷中段。因此，對當地聚落相關訊息的獲得，北段的資料較少且不直接。⁽¹¹³⁾ 而派駐在北段、中段間 Vatan 的士兵 Jan Huybertsz.，則於隔年 1643 年初亡故於駐在地，之後未聞再有派遣人員。所以，荷蘭文獻對 Sibilien 與其它村落關係的記載可說闕如。但是如同 Pisanan 一樣，並不代表此地區就平靜無爭。

(四)縱谷內的小村落

在 Patsiral 勢力南下擴張期間，另一攻擊東印度公司友村住民的村落是 Tervelouw。在 1650 年初左右，Pimaba 駐在員發出的信函，即敘述了 Patsiral、Tervelouw、Soupra 和他們的支持者對東印度公司的友村未見任何減少敵意的跡象。1650 年，Tervelouw 利用和談為藉口的方式，擊殺了一名 Sapat 的住民。⁽¹¹⁴⁾ 隨後同年 Tervelouw 又擊殺了一名 Dorcop 住民。⁽¹¹⁵⁾ 在這段期間，Tervelouw 與 Patsiral 的關係如何，檔案文獻並無直接的資料來詮釋。不過，在 Patsiral 勢力南下擴張的時日，並無任何有關 Tervelouw 與 Patsiral 交戰的記錄，也未有兩者一同與第三者交戰的資料；只是，在荷蘭文獻中兩者所攻擊的對象大致雷同。若再考慮 Soupra 在這段期間與 Patsiral 曾建立類似盟友的關係，則 Tervelouw 與 Patsiral 盟友關係的建立，似乎也不會是不可能的事。實際上，假如一併考慮 Tervelouw 當時的人口數（戶口數）估算值（參照表一），以如此少數的人口，若不與 Patsiral 友好甚或結盟，而要能獨自與 Sapat、Dorcop 作戰，或不被 Patsiral 在勢力擴張過程中所攻擊，實在是有點不太可能。事實上，Tervelouw 在 1645 年即出現在荷蘭文獻內，可是在 1648 年前並無其住民攻擊他村的記錄。此點或許也可作為補充前述 Tervelouw 與 Patsiral 關係的間接佐證。

Verekiel 與 Sorgiol 都是 Patsiral 在 1647 年以降，勢力南下擴張時攻擊或恫嚇的聚落。兩者在目前已印行的文獻都只出現乙次，在三次東臺灣探金記載也都被提及，應該都是人數不多的小聚落。Verekiel 在 1647 年時被 Patsiral 馘首

(113) 像 1643 年 4 月之際，有關 Vatan、Pisanan、Suplien（即 Sibilien）與 Taccalies（即 Takilis）等地的狀況，是前來 Pimaba 報告 Vatan 已摧毀 Serus 一事的 Serus 住民所附帶提供。參閱 *DZII*, p. 83。這些地方，都在 Dorkop、Soupra 等東印度公司當時友村的更北之處。

(114) *DZIII*, p. 116.

(115) *DZIII*, p. 149.

一人。⁽¹¹⁶⁾ Sorgiol 則在 1648 年 Soupra 分裂為親 Patsiral 與親東印度公司兩個陣營時，因收容後者而被 Patsiral 威脅攻伐。當時，收容親東印度公司 Soupra 住民的村落，共有 Sorgiol、Sapat 和 Dorcop 三個。⁽¹¹⁷⁾ 對照表 2-2 的戶口數，除了可看出相較於 Dorcop、Sapat、Soupra 等聚落，Sorigol 是居民數較少的村落外，似乎也反映出 Soupra 分裂、部份住民移居他處的現象。表三裡，Soupra 的戶口數資料只有 1647 年，之後全缺，所反映的應該就是 Soupra 分裂後焚村四散他處的情形。Dorcop、Sapat、Sorigol 在 1648 年或其後 1650 年戶口表數的增加，代表的應該就是原 Soupra 住民的加入吧。⁽¹¹⁸⁾ Sorgiol 在 1647 年、1648 年和 1650 年的戶口數，分別是 34、36、76，前後增加了一倍多；Sapat 在這三年的戶口數分別是 75、92、106，前後增加了快三成；比較奇怪的是 Dorcop，這三年的戶口數分別是 110、114、100，並沒有什麼變化。若再比較此三年期間戶口表內「卑南以北同盟村」欄項，十一個（含 Dorcop、Sapat、Sorgiol 三村）有戶口資料的村落（參照表三），將察覺除了前述 Sapat、Sorgiol 兩村在 1648、1650 兩年的戶口數，比 1647 年戶口數資料有明顯增加外，尚有 Lappelap、Bonock、Arang、Vypuys 等村也是。因此，如果 Soupra 散社後，部份投向東印度公司友村的家族是反映在戶口表內的話，這群人似乎以集中到文書報告內的 Sapat 和 Sorgiol 為主，也有可能是到文獻內未提及且人數更少的小村，像 Lappelap、Bonock、Arang、Vypuys 等。⁽¹¹⁹⁾ 至於 Dorkop 為什麼在戶口記錄上變動不大，是否關聯到 1648 年 Soupra 分社之後，Dorkop 忽然對東印度公司的友村滅首，而引起其它人數較少村落的恐慌（Dorkop 在表三欄項內是人數最多的大社），包括已散社而四處依附他村的 Soupra 人，⁽¹²⁰⁾ 而使原打算投向 Dorkop 的 Soupra 人，因害

(116) *DZII*, p. 593.

(117) *DZIII*, p. 2.

(118) 有關 Soupra 住民移居 Sorgiol 等三村乙事，文獻記載是說「其餘的家族移至友村 Sapat、Dorcop、Sorgiol」(d'andere huysgesinnen metterwoone in de vrundtdorpen Sapat, Dorcop, Sorgiol gecomen waren)，所暗示的應是 Soupra 裡頭的不同家族採不同的對策，而移到 Sorgiol 等三村的是家族（或整戶）的遷徙。因此，移居到它村後，仍保持原有家族體系或戶口單位獨立性的可能性，應該不小。

(119) Lappelap、Bonock、Arang、Vypuys 等四村的戶口數，以 1647 年數值為主，都遠低於 Dorkop、Sapat、或 Sorgiol。像 Vypuys、Lappelap、Bonock 的戶口數，只為 Sorgiol 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而 Sorgiol 又是三村中戶口數最少的。是否是因為是人口稀少的小村，因而在有關 Soupra 的分裂事件中未被提及，還是另有他因，因文獻資料的不足而無法做進一步的推論。

(120) *DZIII*, p. 31.

表三 「卑南以北同盟村」之戶口數

村落 \ 年代	1647	1648	1650	1654	1655	1656
Koeskoes	10	11	11	9	9	
Longelongh	11	11	10	14	24	10
Vypuys	6	6	15	16	16	10
Palang		39	42	42	42	50
Berbyl	30	35	35	35	35	20
Lappelap	8	12	12	12	12	6
Bonock	8	11	15	15	15	6
Arangh	24	27	40	40	40	7
Sapat	75	92	106	106	80	40
Sorgiol	34	36	76	76	76	30
Dorkop	110	114	100	110	110	90

資料來源：中村孝志，〈荷蘭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頁 201-202。

怕攻擊而離去？雖然此一依循相關事件發生次序的推測，看似頗有說服力，可惜文獻中並無進一步的資料可供了解。⁽¹²¹⁾

(五) 相關的海岸山脈東側村落

前文已提到數次的村落 Soupra，早在 1640 年 M. Wesseling 為尋金而出征 Linauw 時，就已途經拜訪過了。記錄中的 Wesseling 與當地住民相處甚歡，當他後來因腳傷而無法繼續北進時，大家還為此而難過。⁽¹²²⁾ 荷蘭文獻有關東臺灣尋金的相關資料中，也曾提到 Takilis 一帶的人會一年一度來此貿易，主要是拿手鐲、耳環等裝飾物前來交換皮貨；東印度公司留駐當地學習語言的士兵 Andriaen

(121) 當然，上述有關 Soupra 散社之後親東印度公司盟村村民移動的推論，是站在戶口表內此段時期村落戶口數的增減與 Soupra 住民移動相關的前提下。但事實是否如此，由於並無檔案文獻或口碑記錄等相關的資料來佐證；因此，只能算是十七世紀原住民聚落史重建工作上一大膽的嘗試性說法。

(122) 郭輝，《巴達維亞城日記一、二冊》，頁 245；村上直次郎，《パタヴィア日誌》，頁 32-33。

Watermont, 在 1641 年即遇見過 Takilis 來的人。⁽¹²³⁾ 不過, Soupra 在東印度公司行政勢力進入花東縱谷的初期, 似乎是臣屬於 Pimaba。在 1644 年 7 月 24 日發生 Vatan 住民襲擊在田間工作的 Soupra 人事件時, Pimaba 即派駐相當兩隊防守村落的人員 (twee torens volcq) 在 Soupra 村進行守衛的工作, 並與來襲的 Vatan 人交戰。⁽¹²⁴⁾

Soupra 與 Pimaba 間的微妙關係是如何建立起來的? 維持這層關係的機制是什麼? 荷蘭文獻並沒有進一步的資料去闡明。對於第一個問題, 比較可能的解釋方式有兩方面, 一是 Pimaba 依靠本身的實力去臣服 Soupra, 這可能是透過武力征伐或土地使用權讓予的方式來建立。移川子之藏與馬淵東一在二十世紀初所做的田野調查即曾指出, Panapanayan (即 Pimaba 村人之自稱) 對習稱的「卑南阿美」和由西臺灣遷移到東臺灣的 Siraya、Makatan、Taivoan 語族人群實施過類似的權利關係。⁽¹²⁵⁾ 在荷蘭文獻中, 1638 年 Jan Juriaense 初訪 Pimaba 時, 曾指出有六、七個小村落是由 Pimaba 所管轄;⁽¹²⁶⁾ 另外一個方式, 則是 Pimaba 透過與東印度公司結盟的方式, 當 Soupra 臣服於東印度公司時, Pimaba 即間接藉由與荷蘭人的關係而將勢力北延到 Soupra。⁽¹²⁷⁾

Soupra 與荷蘭人的關係到底如何? 在荷蘭文獻中, 可約略看出 Soupra 住民與東印度公司之間的關係, 在一六四〇年代中期前還算穩定。早在 1643 年 Pieter Boon 所率探金隊在返程經過 Soupra 夜宿時, 當地住民即備有豬肉、米、小米餅 (geerstcoecken) 款待探金隊一行,⁽¹²⁸⁾ 比起探金隊之前在 Talleroma、Vatan 所受的待遇要好得太多了。翌日離去時, Pieter Boon 甚至放心地留下了兩名因長途行軍而不良於行的士兵於當地。⁽¹²⁹⁾ 1645 年的東臺灣探金之行, 當部隊行過今

(123) 郭輝,《巴達維亞城日記一、二冊》,頁 362、374;村上直次郎,《パタヴィア日誌》,頁 202-203、221。

(124) *DZII*, pp. 321, 327.

(125)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 535-538。

(126) *DZI*, pp. 405-406.

(127) 荷蘭東印度公司勢力在東臺灣擴張期間, 時常藉由 Pimaba 的人力一同出征攻伐其他村落; 如 1639 年底的 Linauw 攻伐, 當時的 Pimaba 駐在員 M. Wesseling 即與 Pimaba 住民一同出兵。參閱 *DZI*, pp. 488-489, 495。

(128) geerstcoecken 若按照字面翻譯是小米餅, 但是很明顯地, 這不是阿美族的傳統食品。可能所敘述的還是小米餅, 但荷蘭人用其熟悉的 geerst 來形容所嚐到的傳統小米餅。

(129) *DZII*, p. 141.

日的掃叭臺地後，一名士兵不慎跌入捕豬的陷阱 (*verkensuijl*)，而被倒鉤 (*scheenangels*) 傷及右腿。此傷兵即和另兩名也因長途行軍而不良於行的兵員先行前來 Soupra，等候探金隊回程時再與其會合。⁽¹³⁰⁾ 到了 1646 年，也就是 Vatan 被東印度公司第三次大規模探金隊回程時攻伐後的一年，駐紮 Sapat 的荷蘭士兵與 Vatan 住民做戰後和平協商時，係先藉 Soupra 住民前去 Vatan 為隨後的商議鋪路。⁽¹³¹⁾ 不過，無論如何，依目前的文獻僅知，當時 Soupra 受到 Pimaba 的「保護」。中村孝志的荷蘭時代戶口表，是將 Soupra 置於「Pimaba 村」的欄項內。⁽¹³²⁾ 從戶口表內東印度公司對 Pimaba 與 Soupra 兩者關係的認知來看，似乎也暗示著此一方向。但是到了 1648 年初，Soupra 與東印度公司的關係開始變壞，間接也影響到和 Pimaba 之間的關係。據 Jan Jansz. 於同年 2 月 20 日發自 Pimaba 信件的说法，Soupra 居民恫嚇留駐在 Sapat 的荷蘭人，並摧毀作為東印度公司權威信物的籐杖。當 Jan Jansz. 伙同十名士兵和兩百五十位 Pimaba 居民前去調查時，肇事者已逃至 Patsiral，其餘的 Soupra 村民則舉家遷至東印度公司的友村 Sapat、Dorkop 和 Sorgiol。Soupra 村早被村民焚毀。⁽¹³³⁾ Soupra 與東印度公司、Pimaba 間的對立，持續到一六五〇年代，Zeelandia 方面在 1650 年 3 月底回覆駐守 Pimaba 的士官 Jan de Bleuw 時，直接擺明、指示將 Soupra 和一些對東印度公司不友善的村落視同敵人。⁽¹³⁴⁾ 1655 年的記錄更明載 Pimaba 與 Patsiral、Soupra 間的戰事。⁽¹³⁵⁾ Soupra 在這段期間和其他村落互動關係的改變，似乎是受到 Patsiral 勢力南下的影響。

Takulles 這個位在 Soupra 南方不遠處的聚落，在 1643 年 Pieter Boon 探金隊行經時，曾對東印度公司提供了十頭豬隻做為補給。⁽¹³⁶⁾ 但是，在文獻資料中未聞與東印度公司進一步的關係，且其與其它村落關係的記載也不多，甚至於不太清楚。不過在 1646 年，也就是 Vatan 為東印度公司第三次東臺灣大規模探金隊

(130) VOC 1218, pp. 435v-436.

(131) *DZII*, p. 511.

(132) 中村孝志，〈荷蘭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頁 204。

(133) *DZIII*, p. 2.

(134) *DZIII*, p. 117.

(135) *DZIII*, p. 502.

(136) *DZII*, p. 141.

所攻伐、焚村之後，卻有報稱 Takulles 的住民因之前經 Vatan 到 Batscheral 一帶打獵時，被 Vatan 住民追獵，而對 Vatan 馘首四人以爲報復乙事。(137)

六、結論與討論

從荷蘭文獻對花蓮一帶原住民聚落、住民記載較豐富的一六三〇年代末期到一六五〇年代初期，這段期間的區域性村落勢力消長，大略以時間剖面整理如下：(138)

在一六三〇年代末期到一六四〇年代初期，東印度公司剛將其勢力範圍拓展到東臺灣時，位於縱谷中段的 Vatan，已是一強大的村落；一直到 1645、1646 年間 Cornelis Caesar 率隊東來之前，縱谷中段 Vatan 的勢力似乎仍持續地擴張著。1643 年，Vatan 兼併了 Serus，之後又攻擊了當時與東印度公司友好、且有 Pimaba 人駐防當地的 Soupra。Vatan 此時勢力的膨脹，也表現在對東印度公司的態度上。像在 1642 年傳出東印度公司留駐 Vatan 的 Jan. Huybertsz. 被當地住民所殺害，之後又阻止鄰近村落派代表參加東印度公司這「外來者」在 Pimaba 所舉辦的東部地方集會。縱谷中段南緣的 Dorkop，1641 年即有荷蘭人派駐於此，但是因其與 Vatan 的友村關係而未在當時對東印度公司直接臣服。至於縱谷北段，當時可能是 Patsiral 爲主的村落，也是 Vatan 勢力無法進入之地，甚至可能與 Vatan 交戰（惡）當中。這可由 Vatan 對 1642 年 Traudenius 率眾擊潰位於海岸山脈的 Patsiral 與其友村一事感到高興，而得到暗示。(139) 至於今日花蓮溪

(137) *DZII*, p. 534.

(138) 本文對「村落勢力擴張」的語意，不同於一般認知中，被擊敗村落完全臣服於戰勝者，或戰勝者享有戰敗者政治、經濟資源的意涵。書中村落勢力的大或小、擴張或萎縮，是表現在村民是否時常對它村發動攻擊或在攻擊行動中獲得較多次的勝利。文中對戰勝與否的涵意，也不在於是否大量地殲滅對方，而是以一般南島語族的村落祭祀型戰爭類型牽涉的規模為主，即以是否馘首成功，而已方人員損失較小的原則為主。有關南島語族祭祀型戰爭所牽涉的規模和勝負標準的文化詮釋，請參考 Anthony Reid 有關近世史時期的討論。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vol. 1 the lands below the wind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22-125.

(139) 1642 年探金隊一行擊潰來襲的 Patsiral 勢力後，翌日行進到 Vatan 時，其長老 (oppersten regent) Roringh 對荷蘭人之前的勝仗顯示出欣喜之色 (. . . , die over de becomen victorie hem verblijft thoonde, . . .)，進而要求探金隊留派一或二員於其村中好學習當地語言。參閱 *DZII*, pp. 12-13; *DB, Anno 1641-1642*, pp. 147-148; 郭輝，《巴達維亞城日記一、二冊》，頁 372；村上直次郎，《パタヴィ

西側的 Pissanan，與東印度公司的關係則若即若離。

1645、1646 年間 Cornelis Caesar 率領的東臺灣探金行，對區域性村落勢力的消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縱谷中段的 Vatan 在被攻伐、焚村之後，其勢力在一六四〇年代後半似乎明顯地下滑。此後，未聞 Vatan 攻擊他村的記載，卻有該聚落為他村攻伐的情形。1647 年興起於縱谷北段的 Patsiral，可能利用此時 Vatan 勢衰之際，南下攻伐該社。但也是在此時約 1646 年左右，東印度公司開始北進到 Sapat 一帶留駐人員。然而，同時 Zeelandia 方面對東臺灣探金的熱潮已漸消退，不再派大軍前來東臺灣，對當地的經營也由積極轉向消極。因此，Sapat 留駐員的象徵意涵遠大於實質意涵，主要在為東印度公司收集當地情報和維持 Pimaba 到 Taraboan 間的陸路交通。至於縱谷北段的村落勢力結構如何，僅知 Patsiral 應該是主要的勢力。至於其他村落，只知 Cornelis Caesar 一行曾招撫 Borine，並要求其每年應至 Soupra 向留駐當地的東印度公司派駐員繳納 10 頭豬隻，以表示服從。不過當 Patsiral 勢力南下，一連串攻擊了縱谷中段的 Vatan、Tavoran、Soupra 等村，1648 年 Soupra 分裂且部份倒向 Patsiral 陣營後，東印度公司與 Borine 原訂的關係，大概也不會存在了。

先前 Patsiral 勢力的南下，於 1648 年之後受阻於 Dorkop 一帶。當時，儘管雙方爭戰互有輸贏，但明顯地看到 Dorkop 以南的村落未受波及。另一方面，1648 年是東印度公司影響力為 Patsiral 逐出 Soupra 的時候。在 1648 年以後到一六五〇年代初期，東印度公司在東臺灣的勢力消退，所得資訊更少，目前僅知此時的 Patsiral 和其盟村，依然在縱谷中段與 Dorkop、北上的 Pimaba 等傳出交戰的記錄，雙方互有斬獲。

整體來看，一六四〇、五〇年代花東縱谷中段是一區域村落勢力互相爭霸的地域，其地理空間範疇最南約至花蓮縣玉里鎮觀音山附近（即 Dorkop 所在地），往東可至秀姑巒溪出海口的 Soupra 一帶。阻止區域村落勢力繼續南下擴張的力

ア日誌》，頁 218-219。值得注意的是在 1642 年之際，Vatan 並未臣屬於東印度公司。相反地，前一年 M. Wesseling 尚計劃要攻伐 Vatan 此一不服東印度公司的村落。參閱 *DZII*, p. 6; *DB, Anno 1641-1642*, p. 55; 郭輝，《巴達維亞城日記一、二冊》，頁 320；村上直次郎，《パタヴィア日誌》，頁 142。Vatan 長老 Roringh 應無理由為東印度公司的戰勝而高興，除非 Vatan 之前與 Patsiral 交惡，才會對東印度公司這第三者的勝仗感到歡喜，進而希望透過與荷蘭人的結盟來穩固其在地方上的勢力。此一結盟動作，即表現在當日要求東印度公司留派人員於其村中的做法。

量，來自首當其衝、曾駐有荷蘭人的 Dorkop 與北上的 Pimaba。在縱谷中段擴張區域村落勢力者，除了有地理位置恰在其中的 Vatan，在一六四〇年代初期曾拓展其影響力至秀姑巒溪口一帶外；一六四〇年代後期至一六五〇年代初期，則有來自縱谷北段的 Patsiral，趁 Vatan 於 1645 年底為東印度公司攻擊後勢衰而南下擴張其勢力。東印度公司對此時期區域村落勢力消長的影響，最有可能是表現在 1645 年對 Vatan 的征伐一役上面。⁽¹⁴⁰⁾

位居荷蘭人勢力核心地域的臺灣西南部平原，其地緣政治發展的軌跡是：東印度公司在地域擴張初期，往往為了制止、保護所屬盟村與其他不在轄屬範圍的區域勢力發生紛爭、衝突，而捲入當地不同區域勢力間的地緣政治；若所屬盟村的敵方具有東印度公司極欲爭取的商業利益（如鹿皮交易等），荷蘭人的勢力即會隨後入侵。換句話說，臺灣西南部平原初始的地緣政治是促成東印度公司地域擴張的重要原因之一。⁽¹⁴¹⁾相較於此，位處荷蘭人勢力邊陲地帶的花東縱谷中、北段，則呈現大異其趣的情狀。東印度公司在此區域最大的商業利益，係發生於北方立霧溪口一六四〇年代曇花一現的探金活動；因此，其勢力一直未能持續穩固的發展與建立。東印度公司大批武裝力量間歇進出所帶來的衝擊，在於荷蘭人不但與當地區域勢力有所衝突，還間接影響區域村落勢力的擴張或衰退。換句話說，在花東縱谷中、北段一帶，東印度公司則是改變當地原初地緣政治的原因之一。

(140) 有關東印度公司對地區村落的武力征伐，為何能對區域村落勢力消長產生影響的可能解釋，請參閱筆者在他文的詮釋。康培德，〈殖民主義、文化接觸與權力展示——荷蘭東印度公司一六四〇年代花蓮地區探金活動〉，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順益原住民博物館主辦，「臺灣原住民國際研討會」，1999年5月1-3日。

(141) Andrade, "The Mightiest Village: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Formosan Plains Austronesians, 1623-1636," pp. 18-19.

引用書目

中村孝志

- 1957 〈十七世紀荷蘭人在臺灣的探金事業〉，《臺灣經濟史五集》，頁 101-123。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研究叢刊第 44 種。又收於吳密察、翁佳音（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頁 165-217。臺北：稻鄉，1997。
- 1992a 〈荷蘭人的臺灣探金事業再論〉，《臺灣風物》42(3):85-18。又收於吳密察、翁佳音（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頁 219-249。
- 1992b 〈荷蘭時代的探金事業補論——特別關於哆囉滿〉，《臺灣風物》42(4):17-23。又收於吳密察、翁佳音（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頁 251-257。
- 1993 〈一六六五年的臺灣東部地方集會〉，《臺灣風物》43(1):155-168。
- 1994 〈荷蘭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臺灣風物》44(1):197-234。
- 1996 〈從村落戶口調查看荷蘭的臺灣原住民統治〉，《臺灣文獻》47(1):143-154。
- 1997 《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概說·產業》。臺北：稻鄉。

江樹生（編審）

- 1997 《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上冊）》。臺北：漢聲。

村上直次郎

- 1972 《パタヴィア日誌》。東京：平凡社。

康培德

- 1998 《荷蘭時代花東地區原住民聚落景觀和族群互動之探討》。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編號 NSC 87-2415-H-026-001。
- 1999a 〈南勢阿美聚落、人口初探：十七到十九世紀〉，《臺灣史研究》4(1):5-48。
- 1999b 〈殖民主義、文化接觸與權力展示——荷蘭東印度公司一六四〇年代花蓮地區探金活動〉，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順益原住民博物館主辦，「臺灣原住民國際研討會」，5月1-3日。

翁佳音

- 1998 《大臺北古地圖考釋》。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

馬淵東一

- 1976 《馬淵東一著作集》第二卷。東京：株式會社社會思想社。

曹永和

- 1979 《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

- 1935 《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臺北：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

郭輝（譯）

- 1970 《巴達維亞城日記一、二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程大學（譯）

- 1990 《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三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遠流出版社

- 1996 《臺灣堡圖》。臺北：遠流。

Andrade, Tonio

- 1998 "The Mightiest Village: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Formosan Plains Austronesians, 1623-1636."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學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主辦，「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5月16-17日。

Blusse, Leonard, W. E. van Opstall and Ts'ao Yung-ho, eds.

1984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 1629-1641*. Gravenhage: M. Nijhoff.

Blusse, Leonard, W. E. Milde and Ts'ao Yung-ho, eds.

1995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I, 1641-1648*. Gravenhage: M. Nijhoff.

1996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deel III, 1648-1655*. Gravenhage: M. Nijhoff.

Chijs, J. A. van der, ed.

1887 *Dagh-register geg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 vant passerende daer ter plaetse als over geheel Nederlands-indin, anno 1640-1641*. 's-Gravenhage: Martinus Hijhoff.

Colenbrander, H. T., ed.

1900 *Dagh-register geg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 vant passerende daer ter plaetse als over geheel Nederlands-indin, anno 1641-1642*. 's-Gravenhage: Martinus Hijhoff.

Fox, James J. and Clifford Sather, eds.

1996 *Origins, Ancestry and Alliance: explorations in Austronesian Ethnography*. Canberra: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Reid, Anthony

1988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vol. 1 the lands below the wind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hepherd, John Robert

1993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Vertente, Christine, Hsueh-chi Hsu and Mi-ch'a Wu

1991 *The Authentic Story of Taiwan — An Illustrated History, based on Ancient Maps, Manuscripts and Prints*. Knokke: Mappamund.

VOC 1218 f. 428-451

Tocht door mij Caesar gedaan voor hoeft toto opsoecken van de goudtgevende revier, als tot straffeen der rebellen van Talleroma ende Vadan.

Zandvliet, Kees (著)、江樹生 (譯)

1997 《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 (下冊)》。臺北：漢聲。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Village Powers within the North and Mid-section of Hua-tung Valley in the 1640s and the 1650s

Peter Kang*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at exploring the history of the changing regional village powers of the Amis or the Pangtsah within the north and mid-section of the Hua-tung Valley in the 1640s and the 1650s by employing the documents left by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or VOC). The paper first reconstructs the geography of settlements described by the Dutch sources and further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settlements and the clan and village identities of the Amis. I then treat the settlements as the basic unit and further try to investigate both the possibl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gional powers and their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of expansion within the north and mid-section of the Hua-tung Valley in the 1640s and the 1650s.

Keywords: Formosan Austronesians, Amis, History of Taiwan, Hualien

*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Hualien Normal College.